

东北文献学家金毓黻

郭 君



东北，这块古老、美丽、富饶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白山黑水之间，古代先民，开疆拓土，繁衍生息，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遗留下丰富的文化典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一部分。

古代东北的史地文献，除见之于封建社会的正史、通鉴、实录，历代官私修纂的地方志书之外，还有大量的文人游士的笔记、文集、野史、佚闻，本地名门望族的谱牒传记等。到了近代，由于我国内政失修，边疆危机，帝国主义觊觎东北。在外患严重的情况下，我国的学者也掀起了研究东北的热潮。他们研究东北的历史、地理，证明东北与中原关系源远流长，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以粉碎帝国主义企图分割中国领土的阴谋。他们搜集整理东北典籍、先贤遗著，以保存东北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在研究东北的学者中，工作最勤奋，成绩最显著的要数著名东北史专家、学者金毓黻先生了。本文就先生在东北时期，在四

川时期和晚年的主要经历和学术研究，进行粗浅的论述和介绍，以纪念这位在东北史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学者。

一、在东北时期

金毓黻，字静庵，号千华山民，辽宁省辽阳县人，生于一八八七年七月十九日（清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六岁入本乡私塾，一九〇七年毕业于辽阳启化高等小学堂，次年考入省立奉天中学堂，一九一三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攻读，一九一六年毕业回东北，先后在省立奉天第一中学堂、奉天文学专门学校任教。一九二五年以后，离开了教育界，先后担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科长、吉长道尹公署科长和长春电灯厂厂长等职。

青年时代的金毓黻，由于受到了系统的正规教育，和他对文学、史学、古文字、金石、考古方面的广泛涉猎，为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一九二二年起即致力于乡邦舆地故实之学。他在《东北文献零拾》小引中说：“余治乡邦文献，始于民国壬戌。”那么他为什么把“乡邦之学”作为自己终生的研究目标？他在《东北通史》引言中说：“不佞世居辽东，基于忧乡之心，研究东北文献，积有岁年”。他又说：“今日有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之多，亦足令人惊叹。试检其国谈东洋史之专著，十册之中，必有一册属于东北，论东方学术之杂志，十篇之中，必有一篇属于东北。世界各国学者，凡欲研究东洋史、东方学术，或进而研究吾国东北史，必取日本之著作为基本材料。以乙国人叙甲国事，其观察之不密，判断之不公，本不待论。重以牵强附会，别有用意，入主出奴，积非成是，世界学者读之，应作如何感想。是其影响之钜，貽患之深，岂待今日而后见？……譬之居家，室中之藏，土田之籍，牛马蕃息之数，戚党隆杀之等，主人概不之知。而其邻人或素昧平生之士，登其庭入其室，开其篋箧，一一而探索之，分类而晰载之，细大不捐，如数家珍，

吾知其家之败可立待，且将挈其所藏以入于他人也。今日之情，何以异是？”“为主人者，极应自计其室中之藏，土田之籍，马牛蕃息之数，戚党隆杀之等，失之东隅，犹可收之桑榆，然则研究东北史，其可缓乎？”他怀着“忧乡之心”，开始了对东北史地文献的研究，几十年如一日，砚田笔耕，凡足迹所能至，不惮跋涉山川，狎犯霜露以赴之。搜求至勤，研讨亦深，在将近半个世纪中，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文献汇编。

一九二七年金毓黻第一部研究东北的著作《辽东文献征略》一书出版。作者在序中云：“北游以来，从公余晷，博稽古书，参以目验，岁月不居，得若干事，次为八卷，题曰《辽东文献征略》。文谓典籍，献谓贤者，凡所甄采，必有依据，故曰征也，随笔摭拾，不成条贯，故曰略也。”全书分郡邑、山川、金石、人物、典籍、杂录等目，记辽宁史事为主，兼及吉、黑两省。郡邑及山川二目，为作者对辽宁古城及东北名山大川的考证，以纠正东北古史上的一些疏舛。如古代东北的挹娄，《辽史·地理志》以沈州为挹娄故地，作者以翔实的史料，证实挹娄故地在长白山北宁古塔地，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作者又考证古代黄龙府当为今之吉林农安县地，从而纠正旧志把黄龙府作为辽宁开原县地之误。另外，据作者所考，黑水为松花江之别称，因其水色微黑而得名，以辨析黑水为黑龙江之外误。人物一目多收文人逸士或其行谊学术为世人不尽知者，作者博考诸书，有见必录，如辽东文人王遵古，辽东三老之戴亨，在正史中不见其传，作者从墓志或其他古籍中搜集，在本书中补之。典籍一目，收辽东古籍之版本罕见者，作者对其版本及内容作了提要式的介绍，“辽东先正著述考”收北魏、金、元、明、清五代辽东先正著述一百五十种的书目，其中有传本仅三十种，而其书已佚或虽有传本尚待寻访的一百二十种，皆为东北文化的珍宝。

《辽东文献征略》一书，虽属札记，但作者收集广泛，考据

精辟，是研究东北的一部颇有价值的资料书和参考书。

一九二八年，金毓黻先生由长春回到奉天，任奉天省议会秘书。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又先后担任东北政务委员会秘书、辽宁省政府秘书长、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从政之余，他仍孜孜不倦于东北史地之研究。首先，他牵头组织了“东北学社”，它以团结同仁，研究学术为宗旨，是当时东北唯一的学术团体。又由教育厅编译处创办《东北丛刊》杂志，这是东北文史学者的一块园地，先生早期的一些重要论文都发表在这里，如《重印吉林通志序》、《辽海丛书总目提要》、《研究东北文献之重要及其方法》、《隄巢集校录》等。在此期间，先生又兼事两部东北文献著作《奉天通志》和《辽海丛书》的编纂。

奉天自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建省以来，一直没有纂修省志，明、清两代修纂的《辽东志》、《全辽志》、《盛京通志》是东北地区的通志，而且已百余年没有续修。当时，《吉林通志》已于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刊印，《黑龙江志稿》已近脱稿，惟奉天省无志，所以，纂修《奉天通志》已势在必行。早在民国初年，奉天省人士即筹划修志，到民国十六年，奉天通志馆方告成立，由张学良任总裁，白永贞、袁金铠任正副馆长，由省长延聘“硕学名儒”担任总纂，被聘为总纂的有吴廷燮、王树枏、金梁、世荣、吴闿生、金毓黻。金毓黻负责纂修《山川志》、《艺文志》。班子搭起之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九一八”事变前，材料大部分收集齐全，有的志目已成初稿。

《辽海丛书》初名《东北丛书》，它是一部东北古代典籍的汇编。早在民国七、八年间，当时的辽宁省教育厅长谢荫昌即发起编辑《东北丛书》，并委托教育厅编译处主其事，可惜未经写出例目即中辍。正在这时，即一九一九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将从中国搜掠去的东北文献汇集出版，命名曰《满蒙丛书》第一

卷，他们计划用三年时间出二十四卷，收书百种，到一九二二年已出完一至五、九、十七各卷。这件事对中国学者是个震动。加快编出《东北丛书》，是东北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担任省教育厅长的金毓黻毅然挑起了这个担子。一九三〇年，金毓黻延请同人组成编辑部，拟定体例，期于三年之内，出书百册。当即开展工作，卓有成效，一年之中即选校出数种。

事变爆发之后，两部著作的编辑人员大部分流亡关内，著作面临夭折之危。在这种情况下，金毓黻暂留敌区，惨淡经营，终于使两部著作得以问世。

《东北丛书》在事变前仅编了一年，刚刚起步。事变后，金毓黻重搭班子，继续此书的编辑。编辑《东北丛书》，意在保存东北典籍，所收群书，大致有四类：一曰专著，凡辽海先正遗著，篇章完整，保存真目，一字不遗者为专著；二曰杂志，凡作者并非辽籍，然其著作为东北掌故，是为杂志。明修辽东、全辽两志及清康熙修的辽宁地区府、州、县志，亦属此类；三曰文徵，凡原刻本或佚或残，汇集残本，刺取字句，纂集成册。附作者小传，意在辑佚，是为文徵；四曰存目，凡诸史艺文志著录，原刻本已佚，予悬集名，以备徵访，是为存目。

体例既定，金毓黻从原始资料的搜集、辑佚、版本的选定、校勘，到印刷发行，无不事必躬亲，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于搜集，先生全力以赴，周咨博访，从私人藏到官方图书馆，更远及海外朝鲜及日本的宿学守藏；于书籍之外，更兼及碑志印信、泉币、明器。致力既勤，所获亦丰，在广收的基础上，择取亦极严谨，其原则是“其为家藏稿本及传抄本而未付刊者，所在宜先；其书虽已付刊而久经绝版者，又次之；其现在虽有传本，而非本编所能遗者，又次之；至于流传甚广，不虞散佚之作，则暂不收入。”（见《辽海丛书》凡例）属于稿本和抄本的，多属作者家藏，从其后人及好友中觅得借抄付印，如清金科

豫撰《解脱纪行录》一卷、金朝觐撰《三槐书屋诗钞》四卷，李放撰《皇清书史》三十五卷，《画家和希录》九卷等，皆属此例。有的典籍更从日本及朝鲜搜得，如唐张楚金撰《翰苑》一卷、宋陈襄撰《使辽语录》一卷、朝鲜柳得恭撰《溱阳录》二卷、《燕台再游录》一卷等皆是。对于原本已亡佚者，先生则多方搜寻其残篇只字，或从他书中辑补，如金王庭筠《黄华集》八卷、清李锺《李铁君文钞》二卷、清王尔烈《瑶峰集》二卷、《大元大一统志》残本十五卷、辑本四卷、考证、附录各一卷等。对入选各书都经过严格校勘，并写出校勘记、叙、跋。对于一书数版者，则用几个版本互校，其讹误太甚者，随时勘正，对不敢断言者，罗列诸本异同，撰校勘原委附于书后。对于《丛书》的印刷发行，先生更颇费周折。为筹划经费，他曾在《东北丛刊》上撰文，呼吁东北当局要为东北人民“立百年之功业”，给予经济上的支援。事变后，印书经费更无着落，只好采取“同人集资刻书”的办法，且编且印且发，到一九三四年，《丛书》编完付印，此时东北已沦陷多年，“东北”二字已不能使用，经多方斟酌，选用“辽海”二字，题名《辽海丛书》，并另组辽海书社印行。

《辽海丛书》共十集百册，收书八十三种，三百七十七卷，附集三十二册，收书四种，一百三十二卷，合计收书八十七种，五百零九卷。此洋洋大观之巨著，是东北文化之荟萃，是集东北地方文献之大成。《辽海丛书》的编成，保存了东北各族文化的精华，留下了东北史地的珍贵史料。同时《辽海丛书》的出版，又对于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的东北人民给以很大鼓舞，国土虽失，图籍犹存，虽历万劫而不灭。而金毓黻和助手们，在敌人暴力之下，疲精殚神，搜残存佚，为东北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事变后，《奉天通志》也处于成败之关键时刻。一方面由于志稿门类繁多，材料庞杂，全书的整理编订工作十分繁重，另方

面由于编辑人员大多离去，余下的少数人年已皆老，馆长白永贞六十八岁，总纂吴廷燮年过七旬，很难承此重任，急需得力人员从事志稿后期工作，否则志稿有散佚之虞。此时金毓黻年方四十有六，正当壮年，又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修志经验，在白永贞、袁金铠的推荐下，担任了通志的专职总纂。先生为志稿做了大量的贯通整理编订工作，据通志馆档案载：“盖造稿之时，旁征博引，不遑逐细研究，因之歧误者有之，重复者有之，乃至修订之日，则须广求未见之书，汇集诸家之说，参稽互证，一一校勘，歧误者正之，重复者删之，遗漏者补之。”最后采取且编且印，编印兼行的办法，到一九三七年印完成书。

《奉天通志》共二十目二百六十卷，六百万字，装订成十函百册，是一部体例完善，内容充实的大型辽宁省通志，是截止“九一八”事变前辽宁省的百科全书。它上自远古，迄于民国，系统地记载了辽宁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保留了丰富的史料，是研究辽宁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宝库。《奉天通志》的完成，是通志编纂者的集体劳动成果，而担任总纂的金梁、王树枏、吴廷燮、世荣、金毓黻等都是东北史的著名学者，使这部志书保证了相当的质量，金毓黻承担主撰的《山川志》、《艺文志》，以考证精辟、资料充实而著称。

金毓黻对东北地方志从理论到实践都作了很大的贡献。他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历朝修纂的辽宁地方志，并进行全面研究、考证，收入《奉天通志·艺文志》和《辽海书徵》，留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辽宁方志目录。他对明修《辽东志》、《全辽志》、清修《盛京通志》各种版本进行研究，考证其关系和每个版本的特点，这些研究成果至今仍为后人所应用。由于他潜心搜集，将清康熙年间修纂的一批府州县志，除《海城县志》已佚之外，包括辽阳、宁远、盖平、铁岭、锦州、锦县、广宁、开原等地的府、

县志，收入《辽海丛书》，使这批珍贵方志得以流传和使用。除《奉天通志》外，他还担任了一九二七年《长春县志》的总编纂。同年，他的家乡辽阳县编修县志，他虽身在外地，仍“采访遗书，邮简寄稿”，积极协助编修志书。另外，他撰写了《重印〈吉林通志〉序》和《辽宁（奉天）通志序》二篇论文，介绍这两部通志的编修及特点。解放后，他在《新观察》上著文，提出他对普修新地方志的意见。总之，金毓黻对东北地方志的研究，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方面，使他成为近代一位颇有名望的方志学专家。

《渤海国志长编》二十卷，是一九三二年金毓黻撰写的一部渤海国史专著。

渤海国是唐武则天时期东北的靺鞨族大祚荣所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这个政权享祚二百二十九年，几与李唐相终始，称为“海东盛国”。但旧史书对这个政权的记载都很简略，《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建章《渤海国志》三卷”，但该书已佚，《旧唐书·北狄传》叙渤海事略具始末，《册府元龟》及日本古籍记渤海朝聘事，亦语焉不详。考东北古代肃慎遗族所立国家，金、清二代皆有史书，而渤海一国史，尚付阙如。及至近代，唐宴著《渤海国志》四卷（一九一九年出版）、黄维翰著《渤海国志》三卷（一九二九年出版）问世，但其“取材未富，立证尚疏”，非中意之作。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金毓黻被拘押，他便利用此“身闲”之机，发篋陈书，将其近六七年来所涉览的有关渤海国的遗文佚事，古迹金石，参看中国史籍及日本、朝鲜的古史资料，编得二十卷，题名《渤海国志长编》。

《渤海国志长编》用别史之例，立纪、表、传、考四体，志前冠以总略，志后附以文徵、丛考、余录，此为“长编”之本意。该书以叙述渤海民族兴废递嬗之迹为主，对于辽灭渤海建东

丹国的史实和渤海遗民的史料亦都兼及，前后涉及四百余年，实质上是一部渤海民族志。本书以史料翔实，精于考辩见长，尤其是“传”、“考”则更为详尽。这部《渤海国志长编》至今仍是研究渤海国历史的重要参考书，可以说金毓黻先生是近代第一位研究渤海国史的历史学家。

一九三四年金毓黻编辑出版了《辽陵石刻集录》六卷。“辽陵”是指辽代庆陵，是辽圣宗、兴宗、道宗的陵墓，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境内。民国初年以来，陆续被发掘，一九三〇年夏，庆陵出土墓志石刻十余方，为汉、契丹二种文字书写，都是圣宗、兴宗、道宗及其皇后的哀册及篆盖，尤其是契丹文字。前此，为人所知契丹文字仅有五字，今则发现一千四百三十九字，为研究辽史及辽代文化、契丹文字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金毓黻多方觅得庆陵石刻拓本，请罗振玉、罗福成撰写释文及考证，并收集当时中外学者对庆陵文物的研究论文，合为二集，厘为六卷，刊印出版，庆陵出土石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辽陵石刻集录》的出版，使这批文物得以流传。

二、在四川时期

金毓黻完成了“九·一八”事变前遗留下来的几部东北文献的编辑工作之后，就设法摆脱日寇的羁缚，逃离伪区。一九三六年，他以养病和考察文物为借口，前往日本。行前将万卷藏书托书商运入关内。当年七月，金毓黻从日本到上海又到南京。经蔡元培介绍，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并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参议。次年五月，离中央大学赴安徽，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同年底到达重庆。当时南京已沦陷，中央大学已迁至重庆，先生又回到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并兼系主任。一九四一年秋，转到四川三

台东北大学任教，直到抗战胜利。

这一时期，金毓黻在教学之暇，仍致力于东北史地文献研究，撰写编印了《东北通史》上编、《东北文献零拾》、《辽海书徵》、《东北古印钩沉》、《东北要览》等著作。

《东北通史》上编初版于一九四一年的四川三台，为石印本，一九四四年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铅印再版行世。编写一部东北通史，是金毓黻多年的宿愿，东北沦陷，飘泊入川，忧乡之心愈重，“兹乃俯仰一室，追述故乡往事，纂为一书。……其意何居，岂非以艮维故乡川原訐美为吾族若祖若宗之新启辟，子孙应念兹在兹永铭心版者乎”。可见，金氏撰写此书，就是让子孙后代知道东北历史，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文献是证，使“蹊田而夺之牛者，终当返故物于旧主”，以此作为收复东北之依据。此书之撰，费时数载，“民国丙子之岁，避地秣陵，授课于南雍，以东北史为目，而关外旧藏亦携以俱来，乃徐徐探篋出之，濡笔编次，衍为讲义，是为东北通史之初稿。迨展转入川，重理行篋，仅三十余万言之讲稿尚在。寻初稿所编次者，始上古迄元末，写成三十七章，尚缺两章未就。去秋去东北大学，乃取旧稿重加整比，并为补撰两章，厘为六卷，是为东北通史上卷，写付手民石印行世。”（见《东北通史》引言）下编拟起明初迄现代，亦为六卷，由于资料未备，当时尚难动笔。

金毓黻撰《东北通史》，是东北通史开山之作。它以丰富的史料，详细的考证，论述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又以东北古代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论述中国历代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及建置沿革。它是一部东北通史，也是一部东北民族史，虽然只写到元代，但直至今天，它仍然是研究东北古代史一部颇有价值的著作。

《东北文献零拾》出版于一九四二年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它是继《辽东文献征略》之后，又一部东北文献汇编。作者在“小

引”中说：“以其随笔摭拾，未具条贯，命曰《东北文献零拾》。”全书为六卷，一百八十余目，收东北典籍、名贤、山川、古迹资料，这些东北掌故，看来是信手拾来，但经作者考证，眉目清楚，资料性强，是编纂史乘很好的参考书。

一九四二年金毓黻还出版了《辽海书徵》六卷，它原是《奉天通志·艺文志》“书徵”部分，这次抽印出版，是一部辽宁典籍的目录书。卷一至卷四为先正遗著，卷五为地方志乘，卷六为掌故杂记，后附书名索引。本书资料是先生多年潜心搜集之所得，每种典籍都系以内容提要、作者简介和版本考证，是研究辽宁文化史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东北古印钩沉》出版于一九四四年，是一部东北古代印谱，全书共收自汉代至明代印谱四十一印。除元代“虎贲军百户印”为金毓黻收藏外，其余皆为友人拓赠。事变后，先生将其带至四川汇集成册，并对每印做了考释，包括印文、背文、时代、发见地、收藏者及拓赠者。这部印谱对研究东北历史和金石，都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东北文献之精品。

一九四四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同人出于对故乡的怀念和抗战胜利后建设东北的需要，发起编纂《东北要览》一书，由金毓黻任主编。这是一部关于东北的综合性资料汇编。全书共十三编，记东北四省（辽、吉、黑、热）的自然情况、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各方面资料。每编均分“九·一八”事变前之概况和伪满州国之现状二部分，对伪满状况记载尤详。其资料多为“东北及平津内来之学生，其冒险阻，犯百难，出生入死，辛苦抱持，辗转携来后方，悉以贡之于本校。”（见该书序）所用资料，力求确实新颖。特别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经济掠夺、统制、开发各项产业，对人民思想言论的统治，对青年儿童的奴化教育，叙述不厌求

详。全书以图表数字为主，反映伪满时期东北现状，是研究伪满洲国对东北统治的文献资料。

在这一时期，金毓黻还为《志林》、《东北》、《边疆研究》、《东北集刊》等杂志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用史实来驳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谬论，对团结人民收复失地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晚 年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次年夏，金毓黻回到东北，参加“东北视察团”工作，并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东北区代表，视察东北文物。八月，他编成《宋辽金史》，被列入大学丛书出版。辽、金二史的纪事，与东北有关者几居其半，但辽、金二史修纂粗疏，讹误很多，改修辽、金史是金毓黻的夙愿，也是他致力研究东北史地的一个原因。他说：“近年在东北发见辽金时代之史迹，多至不可胜记。果由研究东北地理，而从事改修辽、金二史之大业，此亦为吾国史学界结一璀璨光华之果。”可为使后人“食无穷之赐也”。《宋辽金史》的出版既是大学历史系的教科书，又是一部简明的宋、辽、金三代的历史专著，它不仅论述了辽、金与宋代的关系，也兼及西夏、西辽、高丽三国与宋代的关系，它以精辟的考辨而独树一帜。

一九四七年，金毓黻任国史馆纂修、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秋前往北平，从此定居于此。在此期间，仍继续致力于东北文献资料的甄择选录工作，整理东北图书馆藏清室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将明代天启、崇祯两代内外各官署题稿、奏本、摺帖，辑成《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明代部分），共五百二十五件，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研究明史的第一手资料。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金毓黻年已古稀，先后担任北京

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研究员。这一时期他主要从事《太平天国资料》的编辑工作，并收集全国地震资料，编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二册，但对东北研究仍很重视。一九五五年，赤峰县发掘辽墓，出土文物甚丰，金毓黻亲往考察，并撰写《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一文，在《考古通讯》上发表。在此时期还撰写了数篇关于渤海国、辽国的历史和文物研究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金毓黻一生除学术研究硕果卓著之外，还留下了一部卷帙浩繁的《静晤室日记》。这部长篇日记起笔于民国九年（1920）二月十三日，讫于一九六〇年四月三十日，达四十年之久，共三百三十余万言，一百六十九卷，装订成十七函，每函十册，共一百七十册。这部日记内容丰富，包括生活经历、时事政治、治学心得、读书笔记、诗文酬唱、文物搜集，尤其是对东北典章志乘，辽海旧闻佚事，收罗更为宏富，可以说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史学巨著。合之是一部知识宝库，分之可成为若干专著，可编成作者年谱，读书札记、辽海人物录、金石书画经眼录、诗文集等。这部日记是研究作者学术思想、政治态度、治学方法的第一手资料，又是半个世纪国内外政治的风云录。日记为稿本，未刊，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日后如能对《日记》进行研究，并分类整理，将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金毓黻逝世于北京。

金毓黻是现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之一，是著名的东北史专家、东北文献学家、考古学家、辽金史学家。他是东北史地文献研究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他的研究成果惠及后人，做为研究东北文献的后来人，应当继承其精华，补充其不足，把东北地方史研究推进一步。

作者工作单位：辽宁省图书馆